

求是文荟：《求是学刊》发刊200期

总主编：丁立群 李小娟

世界与中国

世界哲学前沿问题选粹

李小娟◆主编

求是文荟：《求是学刊》发刊200期

总主编：丁立群 李小娟

求是

世界与中国

世界哲学前沿问题选粹

李小娟◆主编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与中国：世界哲学前沿问题选粹 / 李小娟
主编.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
(求是文荟：《求是学刊》发刊200期 / 丁立
群，李小娟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351 - 7

I. ①世… II. ①李… III. ①哲学 - 世界 - 文集
IV. ①B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33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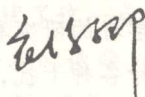
书 名 世界与中国：世界哲学前沿问题选粹
著作责任者 李小娟 主编
出 版 人 李小娟
责 任 编 辑 管小其
出 版 发 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市学府路 74 号 150080)
网 址 <http://www.hljupress.com>
电 子 信 箱 hljupress@163.com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5.75
字 数 550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351 - 7
定 价 5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求索与坚守

——纪念《求是学刊》发刊 200 期



已过“而立之年”的《求是学刊》，带着丰硕的成果和骄人的荣誉，迎来了发刊第 200 期的重要时刻。作为《求是学刊》一直的读者、20 多年的作者，特别是曾经 8 年的编者，我不仅为她日积月累的成果和荣誉而高兴，更为她始终不渝的精神特质而感动，这就是：对真理不懈的求索和对学术品位不变的坚守。

记得 1990 年我作为主持编辑部工作的副主编开始成为《求是学刊》的一个编者时，适逢《求是学刊》公开发行十周年，我在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所写的《唯实·求是·图新》的纪念文章中，开宗明义就清楚地表述了《求是学刊》的基本定位：

一本杂志的刊名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从选定现有刊名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劳作将同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真理的探索联系在一起，唯实、求是、图新将是我们永恒的座右铭。十年的心血、十年的求索，贯穿着始终如一的旨趣：求是！

令人十分欣喜的是，又过去了 20 年，《求是学刊》的这一学术品位和精神追求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已经发扬光大为自己鲜明的办刊特色。必须指出，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高尚的精神无疑在任何时代都会被人们所推崇、所崇敬，但是，要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对精神和真理保持敬畏而不为其他的因素所动心，无论对于一个人、一本杂志、一个学科领域，都是难能可贵的。距今差不多 200 年前（1816 年），大哲学家黑格尔在海得堡大学所做的《哲学史讲演录》开讲辞中就曾经感叹道：“时代的

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①在今天日益丰富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经济的、行政的、人情的和其他非学术的因素,从不同方面挤压着学者的研究和杂志的办刊活动,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要几十年如一日地排除各种干扰,坚守学术尺度和学术品位,更是需要毅力和定力。

因此,黑格尔呼唤一个“那前此向外驰逐的精神将回复到它自身,得到自觉”的时代,期待年青一代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于真理和科学的探讨”。黑格尔强调:“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②

黑格尔这些充满激情的话语,穿越了近200年的历史时空,今天依旧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守望精神的灵性,坚守学术的神圣,并非是在追求一种孤芳自赏的清高,而是渴望着对人类文化中最优秀精髓的自觉传承。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人类的足迹作为具有内在联系的历史,真正能够得以传承的无非有两种东西:自发的文化传统和自觉的文化精神。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知识的积累,特别是历史意识的觉醒,这种自觉地透视人类历史发展内涵、自觉地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定性的文化精神,越来越成为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我一直认为,杂志或期刊为自觉文化精神的生成、培育和传承提供了最好的寓所、平台、载体或温床。1665年1月5日法国的戴·萨罗在巴黎创办的世界上第一本期刊就是《学者杂志》。经过300多年的发展,虽然杂志或期刊已经演变为多种类型,但是,学术期刊毫无疑问一直是最典型的、最有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②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页。

影响力的杂志,这同它与人类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联系密切相关。众所周知,“Magazine”(“期刊”或“杂志”)一词源自法文 Magasin,原意为“仓库”、“知识的仓库”或“军用品供应库”等。但是,真正的学术刊物显然不是给定的、现成的知识的“仓库”,而是活生生的文化精神得以生成的历史地平线,是人类文明的自觉的守望者。

由此不难看出,《求是学刊》的精神追求和学术品位,并没有使之远离生活,远离现实,而是使之在更高的层面上凸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我在1990年所写的《唯实·求是·图新》的文章中,已经阐述了这一点:

世纪之交将为人类带来新的机遇、新的希望和新的使命。

彼此冲突的人类理性将进行一次新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进行一场伟大的知识整合运动;四分五裂的人类历史将汇入马克思所预见的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程。而我们历经磨难民族将逐步告别贫穷与落后的历史,踏上伟大的总体性的现代化的征程。总体性的现代化呼唤着总体性的理论。我们将同我们的读者和作者一道,以实事求是的研究来迎接这一伟大的时代。生活之树常青,理论也不应是灰色的。大变革时代的理论不是黄昏时才起飞的“密纳瓦的猫头鹰”,而是那传说中神奇的“风鸟”,她将为一个新时代报晓,也将为之献身。置身于伟大的人类知识整合运动之中,为现代化理论的建构而尽心竭力,这将是我们的唯实、求是、图新的宗旨。

翻开《求是学刊》的200期学术长卷,从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独树一帜的生产力经济学研究和思维科学探索,到世纪之交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构,从文学批评、历史反思到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处处透露出这一学术期刊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现实的理论穿透。

不仅如此,我在这里还想进一步挖掘出《求是学刊》更深层的学术追求。应当说,对真理不懈的求索和对学术品位不变的坚守不只是《求是学刊》的定位和办刊特色,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之林中,还有很多有影响的杂志,具有同样的追求和类似的定位。我想说的是,在《求是学刊》的学术定位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并继续培育更加值得珍视的精神特质和学术品格。具体说来,主要有二:一是正在走向自觉的“刊物的主体意识”;二是

正在开启的“刊物的国际视野”。

我在谈论“刊物的主体意识”时,是想表达这样的想法:我们在强调杂志或期刊的学术品位时,可以展示出不同的境界和追求。例如,我们可以突出学术期刊的开放的视野和胸怀,对于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对于各种不同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观点,不加限制地给予同等表达的机会,形成百家争鸣的格局。但是,我们也可以强调刊物本身的选择性,而不把刊物当做“安放文章的空架子”,这就是说,我们强调刊物要有明确的“主体意识”,要主动创造和引领特定领域、特定问题域的学术理论热点,积极地推动理论创新,自觉地培育学术流派和理论精神。后一种追求或境界显然要面对更大的挑战,付出更多的艰难探索和精神劳作,才有可能取得进展。但是,它一旦获得突破,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显然会更大。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和发展。1929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多次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这一学术杂志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成为几代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的主要阵地,形成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和社会历史理论流派。从第一代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经第二代中坚布罗代尔,到第三代代表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埃尔·勒华·拉迪里、马克·费罗等人,他们提出的微观史学理论范式深刻影响了欧美的历史学研究和其他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

《求是学刊》在这方面作了初步探索,其典型的研究领域就是文化哲学。1992年《求是学刊》率先在期刊界推出“文化哲学:跨世纪的思考”学术研究专栏,此后又先后设立“文化哲学: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研究”、“文化哲学:全球化的文化反思”等系列专栏,培养了一批文化哲学研究者,使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成为目前中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文化哲学学术中心,并逐步形成了把对人及其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和现实的文化历史批判相结合的独特的文化哲学视野,自觉地提出建构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理解范式和重要的历史解释模式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尽管这些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并极大地带动和引领了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走向。

至于“刊物的国际视野”,显然不难理解,它强调的是:在全球化、信

息化时代,学术研究和学术刊物必须自觉地开启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当今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所有民族的发展,面临的最大的具体情况,最大的现实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和全球化的逻辑。用茨威格的话说,在全球化时代里,“我们岁月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中,尽管我们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依旧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凸显中国特色,但是,无论要使我们的理论思考切中中国的现实,还是要廓清世界的变局,都必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形成开放的世界眼光。在这方面,《求是学刊》有自觉的思考,从本世纪初,就积极开展各种国际学术交流,并在学术期刊界率先开设了“海外来稿”专栏,致力于国内外学术交流,为国内外的学术对话与交流搭建一个学术平台,促进学术期刊不断走向国际,探索开放式、国际化办刊的路径。这一栏目同样在学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我深知,《求是学刊》还很年轻,她的许多探索还处于初始的阶段,还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这不是她的缺点和弱点,而是她的希望、她的开放的未来。精神的追求和学术的探索原本就“总在途中”,真理的探求是永远图新永远不老的神圣事业,更是扎扎实实默默无闻永无止境的辛勤劳作。只要我们不懈地求索,只要我们不变地坚守,就会有越来越广阔的理论地平线在我们的眼前不断开启。我还是用1990年所写的《唯实·求是·图新》的文章中的话来作为这篇随笔的一个“结语”:

我们深知,历史不会只呈现玫瑰色,真理更不会一蹴而就,在我们有限的才能与宏伟的历史使命之间横着单凭我们自身很难逾越的时空。但我们坚信,我们同读者和作者的辛勤劳作,无论如何平凡,都不会毫无价值。“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泰戈尔)我们愿以自己的平凡换取真理的非凡,我们愿以自己的默默无闻换取真理的无穷感召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谨以此寥寥数语来纪念《求是学刊》发刊200期,我更愿意把这篇随笔看做自己学术跋涉的心路历程的记录。愿与《求是学刊》以及更多的学术期刊一道在精神世界中继续上下求索,为我们时代的破浪前行自觉地彰显理论的力量、真理的力量。

2011年1月6日
北京

▶ 追求中西文明的互补并茂

王治河

当你执著于唯一一种观点时，那么就没有比这种观点更可怕的东西了。

——罗杰·冯·奥埃克(Roger Von Oeck)

全球化已日益将人类系连成一个“重叠的命运共同体”(Overlapping Communities of Fate)^①。这意味着，不管愿意与否，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已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了。这就要求我们人类学会和平共处，学会共同生活。从建设性的后现代的视阈看，要学会“共生”，就要学会向他者开放。用安乐哲的话说，如果中国不想只做“世界的唐人街”的话，就要向世界开放，就要同西方对话，而要使对话真正富有成果，就要克服“自以为是”，就要拒绝“夜郎主义”。

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井底之蛙的错误并不在于它坐井观天并把它所看到的天与整个的天联系起来，因为它所看到的那部分天也的确是天；它的错误在于：它不承认有其他观天视角的存在。所谓文明，用怀特海的话说，就是意识到宇宙的广袤和复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夜郎主义”是不文明的，作为其现代表现形态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也是不文明的。

今天，尽管西方的许多媒体依然喜欢“在病理学的意义上致力于妖魔化中国以及中国所做的一切”，西方的学术界“依然忽略亚洲哲学而怡然

^① David Held, *Global Covenant: The Social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Polity, 2004, p. 168.

自若”^①，但是不可否认，在今日西方，对中国和中国智慧的兴趣正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11月16日在上海的演讲中明确表示，美国人有很多东西要向中国学习。几乎同时的《时代周刊》也发表署名文章《美国可向中国学习的五件事》，强调美国应当学习中国人的“雄心勃勃、重视教育、照顾老人、大量储蓄、高瞻远瞩”等经验。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已经为许多西方学者所重视”^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应地，在中国，强调向他者学习，鼓励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也是上至政府下至民间的普遍共识。因为“正是这些不同文明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映生辉，才构成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③。正是这种良性的互动奠定了中西合作的基础，也构成了世界和平的保障。正如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和金丝燕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尊重各种文化特殊性的前提下进行平等的跨文化对话”，是避免中西冲突的关键。可以说，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意识到中西相互对话的必要性、相互理解的重要性的人正在日益增多。“对话”观念，文化互补意识时至今日业已由涓涓细流汇集成一股浩荡的洪流。以至于当今任何反对对话的举措都将不得不面临“文化闭锁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指控。

今日这种强调中西对话和互补之文化生态的形成是许多弄潮儿艰苦努力的结果。然而，这一路走来却并不轻松。这是一场艰难的几近西西弗斯式的劳作。它是中西几代比较文学家、比较哲学家、汉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史学家、神学家以及政治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其中既有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这只知春鸟的功劳（幸运的是已有不少中外学者注意到了其巨大贡献），也有后现代哲学这个土拨鼠的付出。因为它不仅帮助我们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松动了排他主义的坚硬土壤，撬动了闭关锁国的“夜郎主义”的高墙，而且在哲学上倡导尊重他者、倾听他人，呼唤“好客意识”，其功劳需要一部甚至数部专著进行专门阐发。

在这些可敬的推动中西对话的先驱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社会科学》厥功甚伟，黑龙江大学的《求是学刊》也不遑多让。在国内学术

①（美）安乐哲：《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见王成兵：《一位真正的美国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② 汤一介：《反思中的西方学者看中国传统文化》，《人民日报》2005年2月4日。

③ 《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演讲》。

期刊日趋“市场化”的时代,《求是学刊》以播撒思想、传播学术为己任,不仅关注国内学术研究的发展动向,对国际学术前沿也多有涉猎。其开辟的“海外来稿”专栏,十年如一日执著于中西文化交流工作,其独特的学术品位尤其令人称道。读者面前的这部文集就是《求是学刊》丁立群、李小娟等编者在这方面十年耕耘的结晶。

在我看来,这部文集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包容并蓄的编辑理念。从作者群构成的丰富性(既有罗蒂、科布、格里芬等美国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也有安乐哲、贝淡宁等名重一时的汉学家;既有美国学者,也有欧洲学者,还有韩国学者),到选题的多样性(既有纯哲学的探讨,也有海外汉学研究,还有对高等教育与城市生态等现实问题的关注),再到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思辨,又有抽丝剥茧式的微观分析),读者不难感受到编者欣赏差异的开放心胸。而承认他者、欣赏差异正是后现代哲学最为称道的精神品质。

笔者最好将阅读文集的快乐留给读者。由于该文集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是过程哲学方面的研究,而这也正是笔者长期以来所关注的领域,因此以下拟借文集一角,谈一下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在推动中西对话中的宝贵贡献。如果这些“添足”之语有助于读者了解和欣赏本文集所倡导的中西对话、现代与传统对话、第一次启蒙与第二次启蒙的对话,那么本序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自然,方家、读者的批评和指教永远都是受欢迎的。

作为桥梁的过程哲学

由于其开放性和建设性的品格,特别是它所独有的与中国文化的亲和性,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推动中西对话意识和互补意识过程中作出了不可估量的独特贡献。它是一座桥梁,一座沟通中西的桥梁。著名过程哲学家杰伊·迈克丹尼尔(Jay McDaniel)称之为“建设的后现代桥梁”。

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曾明确谈到他的过程哲学或有机哲学“更接近中国思想的某些流派”。按照小约翰·科布的分析,怀特海的基本概念更接近亚洲的特点而非欧洲的特点。而且,由于怀特海本身是科学家,其基于数学和物理学背景发展了这种概念性,因而具有一种系统的

严密性并和当代的各种问题相关(这正是亚洲哲学通常所缺乏的)。怀特海提出了对那种适合于科学的证据、而又不同于其通常形式的实体思维的一种替代,“这样,他就为亚洲人提供了一座桥梁来修正西方科学并融入其自身的世界观”^①。郝大维和安乐哲也认为,由于过程哲学对“变化和过程的优先性”的“信奉”,对“多样性”的“直觉”,使它有助于帮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人”^②。

此外,过程哲学作为一座桥梁,也有助于对中国文化的重新阐释和深度解读。在用过程哲学的框架和概念来重新阐释和发展中国文化方面,过程哲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的工作最为出色。他们的工作被誉为“西方18世纪发明东方主义以来最重要的创造”。在重新解读中国古典哲学的过程中,郝大维和安乐哲借鉴怀特海哲学的过程视角,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哲学所具有的有机论和过程哲学的特征。受怀特海美学秩序(和谐)和理性秩序(和谐)观念的启发和影响,郝大维和安乐哲把理性秩序与因果思维联系起来,同时把美学秩序和关联思维联系起来,以此作为分析和比较西方和中国思想的两种有效工具,取得了累累硕果。他们的研究不仅在比较文化研究中是“革命性的”,而且对推动西方对中国的真正理解,对弘扬互补意识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外两个作出杰出贡献的过程哲学家是美国“波士顿儒家”的创立者南乐山(Robert Neville)和白诗朗(John H. Berthrong)。他们从过程视阈出发,指出了西方的本体论和宇宙论“如何可以经由中国哲学关于创造性的观念来重新思考和重新阐述”。与此同时,他们使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的“惯常理解和解读”在当代过程思维的启迪下“不能不作出改变”^③。

当代西方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在推动中西对话过程中的宝贵努力,在本文集的许多文章中可以得到体现。他们的宝贵贡献在笔者看来体现在下述一些方面。

① (美)小约翰·科布:《怀特海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相关性》,载《世界哲学》2003年第1期。

② 《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110页。

③ 伍安祖:《北美学界朱熹研究近况》,见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

挑战阻碍中西对话的两大障碍——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排他主义

在通往中西对话的路上,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和过程思想家首先挑战的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盘根错节的排他主义,他们视之为阻碍中西沟通和对话的两大主要思想障碍。其实它们是一体的两面,坚持西方中心主义一定走向排他主义。倘若回顾历史,意识到这两大障碍有多么根深蒂固,我们就会由衷地钦佩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和过程思想家的道德勇气和远见卓识,从而把敬意留给他们。

如果我们查一下著名的《牛津英文大词典》,就会发现“Chinese”(中国的)一词的含义是“我不懂、我不知道”。可以说,直到18世纪,中国一直是“神秘”、“另类”和“落后”的代名词。正如周宁教授分析指出的那样,“启蒙运动高潮时期,西方现代性确立,中国形象也相应出现彻底转型。……中国成为停滞衰败的帝国,东方专制的帝国,野蛮和半野蛮的帝国”^①。这一点在当时的西方并非什么少数人的偏见,而是一种普遍的认识,以至于连高喊普世人权和平等的启蒙思想家也不能免俗。

这一信念不仅深刻铸造了西方人的“中国观”和“中国形象”,而且深刻影响了数百年后中国震古烁今的五四启蒙运动。在五四启蒙运动的翘楚那里,中国文明是个受谴责的对象。因为它处处不如西方文明。在胡适眼里,中华民族是个“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与西方文化相比,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②。陈序经因此斩钉截铁地主张“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③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张蓝色文明代替黄色文明的《河殇》的风靡,更是凸显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而后现代和过程思想家则对这一风行现代世界数百年的西方中心主

^① 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见乐黛云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第2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

^② 《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39~640页。

^③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15日。

义提出了挑战。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将某种有限的、特殊的東西非法地夸大为无限的、普通的東西,进而排斥其他有限、特殊的東西。将“西方历史”理所当然地“等同于世界历史”。正如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分析的那样,“我们看成是树干的西方历史已经变成整个森林的一部分。理性的胜利以及由于19世纪工业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带来的斗争只是区域性的重要了”。现在是“到了意识到我们的文化只是许多特殊文化的一种的时候了,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文化的重要性。……故事该结束了。到了开始认真倾听他人的时候了”。所谓“认真倾听”,按照杰伊·麦克丹尼尔的理解就是,要“设身处地站在他者的立场进行倾听,而不是要把他者还原到我们的预设框架中”。

因为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视“西方思维方式为标准的框架”。李约瑟就曾批评了西方人的“精神傲慢”,即“坚信他们自己的文明是唯一普遍的文明”。在他看来,只要我们“仅仅从欧洲的视角”考虑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将“永无解决之日”。

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首先帮助我们“清除堵塞着认识中国道路上的无用杂物”。这些无用杂物中许多是西方主流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教条”。在小约翰·科布看来,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排他主义者是反历史的,因为任何历史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无论以任何方式宣布某种文化或哲学传统是中心或绝对真理,都是荒谬可笑的。事实上,任何文化或哲学传统都不能穷尽真理。对科布来说,把西方文化的任何特征加以绝对化的任何倾向都是偶像崇拜。

揭示西方中心主义风行的深层原因

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的根深蒂固以及携现代性和现代化之势在世界范围的风行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最简单直白的解释是:因为西方的强大。落后就要被人看不起,就要挨打。这几乎已成为人人接受的常识。这话当然不无道理,但细究起来,问题远非那么简单。

毫无疑问,中国和非西方国家在近代的落后,是西方中心主义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从哲学上看还存在着更深层的原因。这个所谓更深层的原因,在我看来,就是“实体优于过程”的思想

在作怪。众所周知,中国的思维是一种过程思维,而现代西方的思维是一种实体思维。对此许多西方学者业已意识到了。怀特海在他的著名的《过程与实在》中指出,中国思想“视过程为终极的”,相反,西方则“视事实为终极的”。曾任法国中国研究协会主席的法国著名汉学家和哲学家于连(FranCois Jullien)教授也注意到,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一种“过程观”,古代汉语里虽然没有“过程”这个词,但“过程”的思想渗透在古文的“道”、“变”、“易”、“神”、“化”等词汇中。

相反,实体思维一直深深地左右着现代西方人的思维。所谓“实体思维”,就是强调世间存在着独立不依、永恒不变的终极实在。这种“独立不依的、永恒不变的终极实在”就是“实体”。从实体出发看待事物,也就是把事物看做独立自主、不假外求的。自从古希腊哲学以来,实体思维就萦绕在西方人的头脑中,进入现代,这种思维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可以说,中西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是导致西方中心主义的盛行和中西对话艰难的深层原因之一。对此应予以足够的注意和研究,否则的话,走向世界就是一句空谈。

对中国文化保持一种真正的敏感性

从欣赏差异的立场出发,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不仅大声呼唤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保持一种真正的敏感性”,而且身体力行努力探索和欣赏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怀特海在他的过程哲学中,区分了两种世界观,一个叫“美学和谐”,另一个叫“逻辑和谐”或“理性和谐”。理性和谐是单向度的,美学和谐则是多维的,它是一种共同创造的和谐。

诺思洛普(Northrop)是这方面的理论先驱之一。在其开拓性的比较文化名著《中西之会》中,他明确提出“东方文化”在根底上是审美的。他认为,东方哲学重直觉,是一种“审美型”思想;西方哲学重推理,是“理论型”思想。

科布非常欣赏诺思洛普所揭示的东西方的这种相遇,认为这一相遇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每一方通过另一方丰富发展但又不丧失自己的灵魂。”崇尚以怀特海为代表的有机主义哲学的著名科学史家李约

瑟,很早就注意到朱熹的有机自然主义与怀特海有机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认为它十分接近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在《科学思想史》中,他专门辟有一节讨论朱熹、莱布尼茨与有机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他明确称宋代的理学在许多方面成为“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①。深受过程哲学影响的当代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也说:“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②

郝大维和安乐哲通过认真的比较分析,勾勒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下列几个方面的不同:1) 在本体论上,西方人偏好“实体”或静止的“事实”优于“过程”,他们崇尚事物的静止和不变;而中国人偏好“过程”,崇尚事物的运动和变化。2) 在知识论上,西方注重理性或经验的“客观性”,存在着理性与感官经验的冲突并且偏好理性思辨;而中国不存在理性和感官经验的冲突,更接近以事物“象”的类推和关联活动来理解事物。3) 西方通过纯粹的抽象思辨和逻辑推论,预设了一种超越的、普遍必然的“原则”(如“上帝之眼”)来认识事物、规范社会,寻求一种“逻辑的或理性的和谐”;而中国人从直接的经验出发观察和体认具体事物,通过调和事物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而达到“审美的和谐”。4) 西方通过构造“定义”以追求客观“本质”的方式来理解事物;而中国不太重视“定义”,却通过“举例”和“示范”的方式说明事物。5) 西方以普遍主义和超越的原则(如上帝的意象)来规定人性,而中国重视文化传统的展开过程对人的塑造,重视文化和道德精英人物的示范作用。^③

安乐哲指出,儒学对于人类经验有其独立的视野,“儒学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西方伦理学传统之外的别一种选择。西方绝大部分伦理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儒学中的‘个人’是处于关系中的‘个人’,强调人的关系性、共生性。这个理念非常健康,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图景”^④。南乐山也认为,儒学有助于对建立在社会契约论

①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何兆武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② (比)普里高津:《从存在到演化》,曾庆宏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③ 参见郝大维和安乐哲:《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40页。

④ (美)安乐哲:《儒学,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世界图景》,《光明日报》2008年6月24日。

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理论提出深刻的批判。因为在儒家那里,对于人类来说并没有自然状态,因为礼仪和文明社会渗透在每一个人之中。为此他特别欣赏儒家的礼仪文化,认为正是礼仪使联合行动成为可能。在他看来,“对礼仪的重视是儒学对当代哲学最重要、最直接的贡献”^①。

与其他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充满期待不同,格里芬则和他的老师科布一样,非常看好当代中国。在格里芬看来,在抵抗美帝国主义,实现后现代转向进程中,中国扮演着一种独一无二的领导性的角色。他用以下几点来说明他的这一观点。1)中国的文化历来没有帝国主义的思想。中国的文明在一段时期内曾经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文明,中国有从事帝国主义的条件,可以统治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但是它却拒绝这样做,它从未意图统治全球。因为这个传统,中国在超越帝国主义体系的作用上是可靠的。2)中国在控制人口增长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使中国在保护生态平衡上有了说服力。3)在21世纪,中国确实很有希望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随着世界对中国伟大文明的认识,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取得领导性的地位。4)中国有第一手的抵制帝国主义的丰富经验。中国人民永远忘不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带给中华民族的惨痛经历。5)中国有深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宗教和文化传统。所以中国在结束帝国主义、实现后现代转向上拥有更多的动力。

彼此互补、相互丰富

尽管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拒绝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并十分欣赏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但他们却无意倡导任何形式的东方中心主义,更无意用东方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取代西方中心主义。

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来,西方中心主义也好,东方中心主义也好,都依然没有跳出非此即彼的现代二元对立思维的窠臼,依然是现代生存竞争思维的牺牲品。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的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彼此互补、相互丰富。这与他们的有机整体世界观是一脉相承的。在诺思洛普看来,在这样一个

^① 《当代儒学思想的扩展形态》,中国儒学网,2009年9月11日。